

延川文典

陕北说书卷

主 编 曹伯植

副主编 曹 彬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序

中共延川县委书记 刘景堂
延川县人民政府县长 张永祥

延川是一块古老而丰厚的土地。

延川是一块神奇而多彩的土地。

走进这块土地，你会因其厚重的文化积淀与历史渊源而肃然起敬，你会因其气势雄壮的黄河景观而激情澎湃，你会因其纯朴的民风 and 朴实厚道的人民而感动。这里的山仿佛和天宇一样古老，但山上的一草一木年年岁岁蓬勃着新的生机。这里的河水伴随着古老的歌谣，日复一日地奔涌着、流淌着，就像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生生不息、勇往直前的人民！

延川县地处陕西省北部，延安市东北部，东临黄河与山西省永和县隔河相望，北与榆林市清涧县接壤，西北与子长县毗邻，西接宝塔区，南靠延长县。东西长 74.25 公里，南北宽 51.5 公里，县域面积 1984 平方公里，人口约 19.2 万。延川是陕西有名的“文化大县”、“作家县”，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也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中国秧歌之乡”。延川地处黄河秦晋峡谷地带，海拔高，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是红枣的最佳优生区；延川出产的红枣品种多，品质好，因此又是国家林业部命名的“中国红枣之乡”。九曲黄河流经延川形成五个蜿蜒曲折、气势恢宏的大湾，其中乾坤湾酷似阴阳太极图，被誉为“天下黄河第一湾”。黄河晋陕大峡谷延川段被《中国国家地理》专家委员会评选为“中国最美的十大峡谷之一”；2005 年该段被国土资源部命名为“延川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陕北是一块举世闻名的红色土地，延川是陕北第一支革命武装的诞生地，也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第一站。这里不仅



曾是中国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陕西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还留下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多处足迹。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一千多名北京知青插队落户到延川，他们不仅在陕北艰苦的环境里磨练了自己，也给这块土地带来了现代文明的气息，知青及知青文化已成为延川现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延川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神疙瘩山有原始社会村落遗址，马家河乡有西周村落遗址。据县志记载：隋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就设立了延川县。远古时代，除不同的部落更迭外，曾有十多个少数民族在此汇聚生息，打猎牧耕，迁徙往返，争战厮杀，屯戍开发。多民族的血缘和文化交流形成了延川独特的文化和历史风貌。古有“文出两川”之说，延川籍才子李邕是陕北历史上唯一的文状元，清末女诗人李娓娓被时人称为“陕北的李清照”。20 世纪 70 年代初，由诗人曹谷溪等创办的文艺小报《山花》在全国一枝独秀，出版的诗集《延安山花》发行量达 28 万多册，这对一个小县来说，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山花》创造的另一个奇迹，是培养了路遥、史铁生、曹谷溪、陶正、海波、远村、厚夫等一茬又一茬的“山花作家群”。《山花》就像开在黄土地上的山丹丹花一样，越开越红，芳香四溢。《山花》的发展还带动了延川其他艺术的蓬勃生长：地方小戏一路演到中南海；新编现代戏《九月枣儿红》获陕西省首届秦腔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影视剧《半个红月亮》《模范张民办》《院长大人》等相继开拍并走上央视荧屏；民间艺术剪纸、布堆画异军突起，涌现出高凤莲、冯山云、刘洁琼、郭如林等民间艺术家。延川当代文学艺术人才辈出的繁荣景象，不仅与这方地灵人杰的土地有关联，也与历届党委、政府重视文化、重视人才的优秀传统有着很大的关系。

近年来，延川县委、县政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实施“一个中心、两个带动、三大工程”战略，提出了“加快发展、转型发展”战略任务和建设“奋进、生态、幸福”延川的奋斗目标，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带领全县 19 万人民舒展着发展壮大的翅膀，实现着强县富民的理想。组织编纂《延川文典》不仅是打造文化大县的具体体现，也是构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务实举措。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谈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我们的根。编纂《延川文典》不仅是对延川历史文化的一次梳理，也是对地域优秀文化的集中展示和发扬光大。

《延川文典》共 21 卷 1200 多万字，收录了延川的人文历史、民俗风情、名胜古迹、文艺作品，集中反映了延川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变迁及发展成就，旨在让世界了解延川，让延川走向世界，是一套具有学术价值与收藏价值的大型地方文化书库。《延川文典》的出版，不仅对促进延川文化事业的建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对全面推进延川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传承和研究陕北文化将有历史性的意义。

在《延川文典》出版之际，我们期望全县人民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引下，抓住历史机遇，立足新起点，再造新优势，把我县各项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以斯为序。

2015 年 5 月 28 日



目 录

概 述

延川说书概述	(3)
陕北说书的分类及其主要特点	(10)
陕北说书的艺术特色	(31)

传统曲目选

大脚娘（一）	(61)
大脚娘（二）	(63)
秃子尿床	(67)
刮大风	(69)
酒迷	(72)
童祖夸寿	(76)
蒸年糕	(82)
半碗饴饬	(85)



双钉记	(89)
汗巾记	(167)
盆盆告状	(258)
铁马记	(301)

传统唱腔音乐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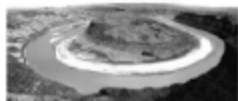
唱腔选	(327)
他老家比亲娘亲十分	(327)
自古害人害本身	(331)
酒色财气四堵墙	(334)
留下我伺候你们能不能	(338)
谁给你来申冤报仇恨	(340)
春红说罢扬长去	(342)
拿起琵琶打起板	(347)
谜语	(348)
杨虎一听气死我	(350)
人王面前两颗瓜	(352)
我要和安童把酒饮	(353)
秃子尿床	(355)
大小老婆	(359)
有一等愚蠢人不听教养	(364)
上头曲	(366)
刮大风	(368)
一根担担六尺三	(374)
桂梅桂莲女姣容	(374)
斩白蛇	(375)
高高山上一钵槐	(380)
悄悄走 暗暗行	(381)
祭祀音乐选	(382)



请神调（一）	（382）
请神调（二）	（384）
安神调（一）	（388）
安神调（二）	（392）
安神调（三）	（393）
参神调	（399）
吴起说书供神调	（410）
送神调（一）	（412）
送神调（二）	（414）
伴奏音乐选	（416）
靠山老调大起板（一）	（416）
靠山老调大起板（二）	（417）
琵琶大起板（一）	（418）
琵琶大起板（二）	（418）
琵琶大起板（三）	（420）
琵琶大起板（四）	（420）
三弦大起板（一）	（421）
三弦大起板（二）	（423）
三弦大起板（三）	（424）
三弦大起板（四）	（425）
三弦大起板（五）	（426）
琵琶武调大起板	（427）
三弦武调大过门	（429）
各种曲牌选	（431）

附 录

山丹丹花儿绚丽开放	李 希（447）
共同推动曲艺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刘兰芳（449）
聊陕北说书 道人世真情	曹谷溪（451）



有历史责任感的文化承担	厚 夫 (455)
来得高兴 来得值	贺 艺 (458)
说书艺人及说书工作者简介	直 木 (460)
后记	(475)

概述





延川说书概述

直 木

延川说书属陕北说书的一支，属陕北中路说书。形式和风格与子长、清涧说书最接近。过去基本是清一色琵琶说书，20世纪40年代起，改造旧说书，提倡说新书，受韩起祥等影响，延川说书也逐渐使用三弦伴奏。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由于受张俊功说书的影响，明眼人说书逐渐增多。现在基本成了三弦说书，目前延川只有张成祥一人使用琵琶，据我了解，整个陕北现在还在行艺的老艺人中，用琵琶说书的已经没几个人了。

陕北说书源远流长，现已无证可考，民间传说从三皇治世时就有了说书。王毓华先生撰写的《韩起祥谈陕北说书历史》中写道“韩起祥在他留下的录音资料中说，他在十四五岁时，师傅亲口给他传说三皇时留下说书。三皇是姓黄的黄。相传，很早以前（约奴隶社会时），有一个老汉生了三个儿子，都给奴隶主赶骡子。大儿子叫大黄，叫奴隶主把一只手剁了，二儿子二黄的一条腿被打坏了，三儿子三黄侍候太太时被她拿锥子把眼扎瞎了。奴隶主赶走了弟兄三人，他们流落在陕北一个叫青化县的地方，以乞讨度日。一天大黄拾到两片烂木板，一边走一边敲打着，走到一家有钱人的门



上说了些吉利话，吃了些剩饭，发现比以前光喊叫强了。有一次人家吃羊，他们要来羊肠子，晒干后绷在木板上，弹出点声音来。二黄给这木板配了个头，路过深山时见了一只死蝎子，又把蝎子尾巴用草绳连接到木板上，就成了琵琶了。所以，今天旧式琵琶看上去就像蝎子一样。陕北的榆林地区至今仍有人把蝎子叫琵琶。这是琵琶的来源。

二黄一见琵琶好，又捡两根小木棍让大黄敲，这就成了梆子。后来二黄又想，要是大哥去世后谁敲梆子呢？他灵机一动，干脆把它绑在腿上自打自弹，这就是最初的甩板。

不久，老大老二过了山西临县一带，三黄在陕北娶了婆姨，生了五个儿子，把弹琵琶的技艺教给了儿子。大黄成家后收了三十六个徒弟，将三弦传给了十八个徒弟，后来又在榆林一带安了家。以莲花落、琵琶、三弦为生，后来三个弟兄都把这些技艺传给后人。三黄收的十八个徒弟，徒弟们长大后成了才，改编曲调，所以陕北说书有‘九腔十八调’之说。后来一代一代加以改进，把两块木板连在一起就叫‘莲花落’。后来又有了双音、单音、落子调、慢板、快板之分。

再后来又进了一步，由讨饭说到家里说。传说当时有两个员外，一个姓牛，一个姓马，他们爱听故事，就把盲艺人叫到家里唱曲说书。先是走乡串巷，后来在一家住下来十天半月地说，给土地神说书，给娘娘庙说书。”

另一种传说，三皇是天皇、地皇、人皇。三皇太子的眼瞎了，被赶出来，他遇到蝎子，抽出它的筋来绷到木板上做成了琵琶，所以说是三皇留下的琵琶。

总之，传说说书是三黄（皇）留下來的。陕北盲艺人到了五月端阳、七月十五有三黄（皇）庙会，南来北往的，只要是盲艺人，不管你是哪个调子，只要来说唱陕北说书就管饭，说书就给钱，已然成了风俗。

当然这是一种民间传说，不足以作为历史考证，但起码也能说明在民间传说中陕北说书历史久远。

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相关分析，作一个大致的估计。首先，我们可不可以认为说书和人类的语言同时产生，或者更早呢？对此，我们试作以下的分析：



一、对尚未学会说话的小孩之间的交流的分析

我们知道，小孩子在不会说话之前就先学会吟唱，初学说话的小孩有明显的吟唱痕迹，有的一直要保持许久。同时未学会说话的小孩并非不会交流感情、表达愿望，只不过他们交流和表达的方式只限于吟唱或啼哭罢了。我们还会看到，几个未学会说话的小孩在一起交流并非是对等的。总是有一个或几个小孩在某一方面表现得更突出、更生动，从而成了其他小孩所欣赏的对象。这个被众人欣赏的对象身上就具有潜在的说书人的影子。到小孩学会说话以后，这些潜在的说书人的优势便越来越明显，他们用这种技能赢得尊重甚至还能换来零食吃等等。从本质上说，人类的童年和一个人的童年是相似的，从小孩身上我们不难看到人类早期的影子。就此，我们可以得出说唱艺术的产生早于语言的结论来。陕北说书也当然不例外了。

二、对史前神话的分析

世界上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早于其文字的产生。就是说在没有文字作记载工具以前的那部分历史，是口述历史，是以口耳相传为唯一流传途径的。那么这些神话历史是怎样流传下来的呢？是怎样产生并发展到足以能流传的程度的呢？单靠巫神流传的说法是不足信的。因为巫神即使能担当流传、传播的作用，但却无法单独去创造这些神话，他们只能在众多神话中择其优者发扬光大。这样便不难看出这些神话故事在流传之前有一个产生、积累、筛选的过程，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无数人筛选后又经过加工、润色，最后才流传下来的。这些创造者、加工者就可能是最初的说书艺人，或者说，说书艺人就是在这些人中产生出来的。

关于这一点，许多人也在著述中提到过，但是大多相当概括，相当抽象。最多见的例子就是套用劳动原理。其实这是远远不够的。传说、神话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原因是，在那个原始的、充满活力的、漫长的时期，人类的个性容易得到张扬。所谓个性容易得到张扬可以作以下几方面的理解：其一，那时的社会环境相对和谐，人们之间少有等级尊卑差别，人和大自然之间的尖锐矛盾迫使人类和谐一致，共同对敌。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人的个



性和才华都容易得到张扬的机会；其二，由于那时私有制没有出现，人类本身还比较单纯，自我限制较少，因此在内因上造成了个性张扬的条件；其三，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舞蹈、歌唱、说书既是娱乐手段又是交流手段，既表情又达意，因此普及程度很高。

三、典籍的印证

一部人类的史前史其实就是一部神话故事的集成。盘古、女娲、伏羲、神农、黄帝、蚩尤、后羿、大禹是这样，鲁班、李冰、共工、刑天也是这样；华夏民族是这样，世界各民族也是这样。别的不说，目前具有巨大影响的几大宗教的经典都是些神话故事，具体表达形式和说书艺术是相类似和相近的。也可以说是说书人所创造流传下来的。

我国对说书人的最早记载始于周礼，是对瞽者，即盲艺人的记载。《周礼·春官宗伯下》中有这样一段话“瞽朦掌播鼗、祝、圉、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

从文中所叙盲人所掌执的乐器来看，这和说书有密切关系。刘向在《列女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跽，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夜则令瞽者诵诗，道正事。”其中的“瞽”者就是说书人，“正事”就是道德修养方面的书文。秦汉之际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就更多了。如《礼记·乐记》中“及优侏儒，猿杂子女。”

《史记·李斯列传》中“侏儒倡优之好，不列于前。”

《孔子家语·相鲁》中“齐奏宫中之乐，俳优侏儒戏于前。”

这其中的“俳优侏儒”除过一部分舞蹈者之外，其余大部分都为说书人。因为就当时情况而言，其他艺术门类还远远没有成形。

关于“稗官”和“方士”的记载。稗官是专门搜集“街谈巷语”、“里巷风俗”的官员。《汉书·艺文志》如淳注中说“王者欲知里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而稗官所记录的东西后世称之为稗官小说，也就是指故事。既然是故事，又来自“街谈巷语”，自然就是民间故事，自然就出自民间说书人的口了。方士主要是敬神、治病的。这些人为了夸大自己的作用，自神其术，把民间故事提炼集中，改造夸大，从而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方士所讲述的故事流传下来的不少，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



在历史典籍中记载最完备的要数《史记》和《汉书》了。《史记·滑稽列传》记“优孟，故楚之乐人也。长八尺，多辩，常以谈笑讽谏。”《汉书·严助传》记：“（东方）朔、（枚）皋不能持论，上颇俳优畜之。”其中俳优是指那些语言滑稽、专以戏谑供人取乐的人。由此可见东方朔、枚皋等人都是从民间选拔上来的说书人中的高手。联系前面提到的稗官采风，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民间说书之风的繁盛了。因为，没有繁盛的说书之风就很难产生像东方朔、枚皋这样的高手；民间说书的影响不大，就不足以引起皇帝的兴趣，就不可能为采集它而专设稗官，为娱乐而选拔东方朔、枚皋之流，也就不可能有稗官小说的整理和流传了。而方士则是另外一种说书人的类型。由他们开始可直接上溯到远古神话。方士神话与稗官小说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处仅仅在创作手法上。前者较为浪漫，后者较为现实；前者敬神鬼，后者重人生而已。

说到这里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说书与戏剧、小说的关系问题。历来的戏剧研究者都将戏剧的源头溯及东方朔、枚皋，把俳优看做最早的戏剧演员。而小说研究者又把稗官小说作为最早的小说。这样一来会不会把说书“挤”出来呢？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因为戏剧和小说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比起说书来要苛刻得多。戏剧需要配合默契的演员阵容，相对集中的观众人群；小说需要一大批有文化的读者。这些条件在当时是无法具备的，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戏剧和小说无法形成。而说书仅需一人一口，兴至而起，兴尽而歇，人人可以参与，人人可以欣赏，说书才是当时民间最主要的娱乐方式。戏剧、小说是在说书的基础上繁衍和发展的。

陕北说书这个名称的确定时间并不早，过去一直叫说书，观众的欣赏叫听书。韩起祥是现当代陕北说书的代表人物，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却很少说他是陕北说书艺人，而称其为“民间艺术家”（苏联H·费道连科著《访中国民间艺术家韩起祥》）、“盲艺人”（林山著《盲艺人韩起祥》）、“说唱大师”（若望著《陕北高原上的说唱大师》）。解放战争时期，“陕北说书”这个名称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隆隆战车横扫全中国进而“一把黄土满天扬”。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说书这个艺术品种和它的活动要见于报端和刊物，为了将陕北的说书与其他地方的说书区别开来，便给陕北的说书冠以“陕北”二字，便成了“陕北说书”。再到后来辞书中出现，便固定下来了。



延川的陕北说书的形成、发展大概与整个陕北说书的形成与发展是一致的。

现在延川的陕北说书，只能从建立起盲人曲艺队说起。

延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那时的县级以上文艺组织，多叫宣传队），始建于1964年春。1962年郝能、吉凤祥、呼兴才、冯月林去延安盲人训练班学习，1963年训练班结束，郝能与呼兴才回县开始下乡演出，此时还只是个人活动。说唱内容主要是配合学习雷锋运动和阶级教育，节目有《雷锋参军》、《王丕勤走南路》、《打黄狼》、《机关枪》等。

1964年初，组织起“延川县盲人曲艺说唱队”，人员有：郝能、张生瑞、张国治、刘贺连、冯月林、樊世凯、吉凤祥、白志亮、呼兴才、樊玉祥等10人，分为三个小组，队长由吉凤祥（永坪人）担任，属文教局领导。那时的延川说书基本是琵琶说书，如吉凤祥、郝能、呼兴才、白志亮、樊世凯等全是弹琵琶的，其时主要是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阶级教育。说唱内容多为韩起祥创作书目，如《回乡记》、大小《翻身记》、《刘巧团圆》、《宜川大胜利》，及尚爱仁创编的《王贵与李香香》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曲艺队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曲艺宣传队”，人数由原来的10人减为8人（刘贺连、张国治离队），仍为三组，当时说唱内容主要是配合“文化大革命”和学习毛主席著作，节目大多为改编了的“样板戏”，另有小节目如《儿女婚事》、《批判小资产阶级》、《蔡永祥》、《一块银元》、《母女会》、《毛主席走过金水桥》等。1972年交县文化馆领导。

1976年10月以后，改名为“延川县盲人曲艺宣传队”，说唱内容有批判“四人帮”的，如《四人帮吃草》，也有宣传农业学大寨的，如《学大寨》、《夜战灯》等。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大解放，说唱内容又恢复了不少传统节目，如《汗巾记》、《四女下凡》、《青铜记》等。同时个别队员又重操旧业，搞一些算命、保锁娃娃等活动。1983年冬，由文化馆组织，整顿一个月，队长吉凤祥因年事高退休，由樊玉祥任队长，贺生明任副队长。从此，每年集训一个月，并在县城各机关单位巡回演出，已成为延续至今的固定形式。

1984年，曲艺宣传队进行了改革，由三组变为四组，说唱内容除过反



动的、诲淫诲盗的内容而外，只要是健康的，从古至今，都可以说。工资待遇也由原来的评分付酬变为只交公共积累（因人不同，每年有交 120 元的，有交 72 元的），其余归个人所有，大大调动了队员的积极性。

1985 年由贺生明主持工作，因樊玉祥转为正式教师，1986 年离开曲艺队，贺生明正式任队长。曲艺队除每年 6 月到县城来集训外，基本是单独活动，带徒弟的是师徒二人下乡。一般是给生产队说书，每场 5 元，给个人说，每场 4 元的报酬。从 1993 年开始，由于社会上的明眼人不断加入这一行列，盲艺人也只好再两三人自由组织行艺，时分时合的现象一直存在至今。2005 年贺生明退休，由高加雄任队长。

1989 年起，先后有高永厚、曹世雄、康永军、杨广林等青年人加入说书队伍，延川的陕北说书有所提高。1993 年曹伯炎、甄三梅开始说书，从此，延川的说书正式登上大雅之堂，在中央电视台等重要媒体频频露面，延川的陕北说书步入辉煌阶段。